

讓我們說一個故事

「原來如此：原住民族文學轉型正義特展」策展始末

文 | 簡弘毅 展示教育組 圖 | 國立臺灣文學館

討論原住民族轉型正義的第一步，應從「憐憫」、「他者化」的觀點中抽離出來，讓原住民族為自我發聲，透過自我言說，闡述最貼近的感受與真實的狀態，以喚起更多關注與認識，才能進而追求還原及和解，而不只是把它當作過去歲月中的歷史錯誤。

「我們感到憐憫，指的是我們感到自己不是釀造災痛者的幫兇。我們的憐憫宣告了我們的無辜清白，以及我們宛如真切的無能為力感。」

——蘇珊·桑塔格，《旁觀他人之痛苦》

原住民族的轉型正義

近年來，臺灣社會對於所謂「轉型正義」，日漸有了清楚的認識，也在許多有志之士的努力下，以各種不同形式的方式，展開對臺灣歷史的轉型正義思辯與對話，並促使 2016 年上台的蔡英文總統，以國家機制和法律，正式展開多項轉型正義工程。當然，這項工作的推進是困難的，充滿了各種挑戰和保守力量的反對，但對於終極目標，即歷史真相的釐清與還原，則可說已取得社會多數的共識。

然而我們卻很容易在上述的歷史辯證中，忽略了臺灣這座島嶼上的真正主人：原住民族，其實面臨更長久複雜的歷史壓迫，與更具體的生存危機。同樣的，攸關原住民族權益的相關運動，已持續推動了數十年，卻得等到 2016 年 8 月 1 日原住民日，才由蔡總統以國家元首身分，向臺灣原住民族道歉，才開始以國家之名，成立「總統府原住民族歷史正義與轉型正義委員會（原轉會）」，作為後續政府與原住民各族裔共同追求正義、對等協商政策方向的對話平台。

不論是哪個層級的機構，或是什麼議題的轉型正義，推動的過程總是充滿艱辛，也最需要與當事人和社會大眾進行對話，才能在社會共識的基礎下推動。這向來是不



容易的，因為轉型正義往往伴隨著清算過往的政黨或當權者，糾正歷史錯誤的同時也意味著迫使當權者認錯，都容易受到保守陣營的抗議，也加深對話的困難度。對所謂「加害者」的寬容，卻又難以促成真正的正義，進而為受剝削者取得復返的權益。因此，相關的推動工作，注定是緩慢而迂迴的前進道路。

臺灣原住民族的轉型正義議題，依前述總統府原轉會的分組，可分為「土地」、「文化」、「語言」、「歷史」、「和解」五大議題，各有其不同脈絡和歷史難題，卻又可以化約為一個概念，即是族群生存的危機。不論是傳統土地領域、語言、姓名、部落文化或歷史詮釋權，都面臨著流失、被剝奪、被否定的命運，亦即各民族賴以維生的一切基礎，都在受壓迫與剝奪的歷史發展中漸漸消失，進而威脅著族群命運。這些問題或狀態，對以漢人為多數的臺灣社會而言，卻總是被忽略、漠視的，除了原住民族人或關注者，多數的「我們」是感受不到的。而無感，往往是一項運動的最大殺手。

臺灣的原住民族轉型正義，面臨著除了「無感」之外，更弔詭的雙重打擊，即是「刻板印象」。21世紀的我們，早已習慣原、漢共處的社會，生活中彼此和諧共存的原住民族人，卻往往在不經意間成為了相對於「我們」的「他者」，例如我們輕易為原住民朋友冠以「很幽默」、「很會唱歌」或者「運動很強」的既定形象，或者模仿、戲謔化原住民族的華語口音，縱使這些出發點可能只是善意或歡樂，卻仍是隱形的歧視與「他者化」觀點。當漢人總是輕易的將原住民族貼上各種標籤，那麼當討論到諸如原住民族語言流失、土地正義的課題時，人們便容易不自覺而採取「憐憫」的心態，彷彿那些歷史錯誤或生存危機，是由一群遙遠的當權者所犯的既定錯誤，而那些不正義的行為，也將只是過去歲月中的歷史錯誤。

因此，討論原住民族轉型正義的第一步，或許就該從這種「他者化」的觀點中抽離出來，讓原住民族為自我發聲，透過自我言說，闡述最貼近的感受與真實的狀態，以喚起更多關注與認識，才能進而追求還原及和解。

策展理念

在這樣的基礎上，也就不難理解國立臺灣文學館在今年5月所舉辦的「原來如此：原住民族文學轉型正義特展」（以下簡稱本展），為何採取最簡單直接的方式，來訴說此一嚴肅議題的原因了。本展拉出五個子題，在每個分區中以一篇文學作品的摘要或陳述，選取該子題相關的原住民作家作品一則；或是播放當代原住民創作歌曲，藉由創作文本，直接說一個簡單的故事，讓故事文本帶領參觀者走進並理解該議題的要義，達到概念傳達的效果。

本展的策展理念，便是以文學為核心，透過當代原住民作家的文本作為媒介，闡述有關原住民族轉型正義中的諸多課題，再搭配延伸閱讀的書單、影音作品，引發大眾對此一議題的興趣，而非陳述原住民族轉型正義的歷史脈絡、發展軌跡，並試圖以較為輕鬆的手法加以呈現，提高人們走進一看的意願，在有趣、淺顯或委婉嘲諷的文學作品中，領略箇中的複雜感受。

走進展場裡，首先映入眼中的是當代原住民文學創作年表，與當代原住民相關的大事件作對照，除了認識原住民漢語／母語文學的發展歷程，也能扣合社會發展、原權運動、相關政策等資訊同步理解，進而思索文學與社會發展脈絡的相互關係。除了時間軸，展牆上的原住民作家地圖，則將作家與出生地或相關事件做連結，以地理空間為軸，呈現部落位置與原住民文學的緊密關係。

分區介紹

在這區同時展出了原住民文學發展中重要的刊物，如《高山青》、《獵人文化》、《山海文化》等雜誌之創刊號，和晨星出版社所出版之一系列原住民文學作品集。此處除了介紹文學發展脈絡，更重要的是呈現原住民族從「被書寫的客體」走到「自我發聲的主體」，文學創作是當中最重要的關鍵，在普遍認知欠缺文字書寫的原住民族，唯有透過主流文化，即漢文字書寫的途徑，才能展開自我書寫、自我發聲的工作，



聆聽是認識的開始。



這當中多數作家都是戰後接受國民教育的第一代原住民知識分子，通過漢語文學的書寫，以及辦刊物、報紙和出版的途徑，原住民族才開始真正掌握發言權，為自身權益和族群文化進行戰鬥，並為傳統文化展開保存與捍衛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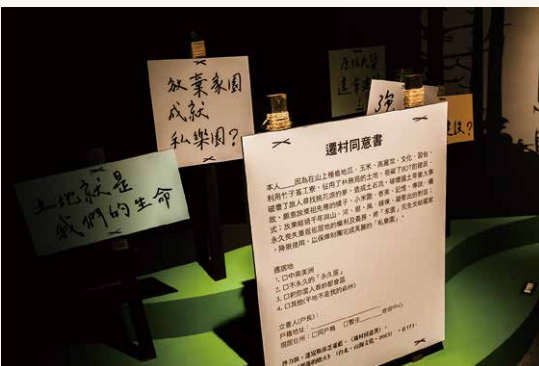
對照同一展櫃內，早期古典漢詩中，諸如《海音詩》、〈蕃歌〉，或賴和〈南國哀歌〉等文學作品，原住民族既是被描繪書寫的對象，也容易流於野蠻、蕃化的刻板印象，縱使站在原住民的角度為其發聲，也是一種來自「他者」的悲憫心情。由此對照觀之，更可以看出文學詮釋主體的轉移，正是原住民族轉型正義的縮影與前哨。擁有自我言說的權力，原住民文學才能開展。

第二區訴說的是原住民族轉型正義最首要的課題，即是土地正義。展區標題援引排灣族詩人莫那能的詩句「在自己的土地上流浪」，土地的流失與傳統領域的被佔領，體現在許許多多的社會爭議事件，也是各部落族人最強烈的不滿。近年由於花蓮「亞泥事件」、臺東「美麗灣事件」的廣受關注，今天我們對此一議題或許不陌生，但在原住民作家的筆下，又是如何呈現呢？

展場中，介紹了布農族詩人沙力浪・達亥斯菲芝萊藍的散文詩〈遷村同意書〉，這首詩以近似政府公告的形式來書寫，模擬官方的文書格式，透過現實及虛擬、亦莊亦諧的敘事手法，點出了國家山林開發政策、遷村配套措施，以及政客談話內容的荒謬。誰才應該要謙卑地無條件讓出傳統土地，讓渡給商人或政府，以遂行其開發的諸多利益？這個問題在詩中被空白了下來，形同一個填空题，像一張空白支票

般被彰顯著。看似荒謬而無人簽署的遷村同意書，卻是許多原住民族赤裸裸的慘痛經驗，土地被讓出了，傳統的文化與部落關係也就隨之被剷平。這樣的詩句幾無尖銳控訴，卻又無比沈痛，直指所謂的經濟奇蹟與社會繁榮，經常是來自原住民族的土地不正義所換得。

第三區名為「我不了解你的明白一語言文化」，取自原住民族經常用以自嘲的「原化漢語」，被改寫的語法結構同時反轉了漢語霸權的地位，卻也正足以說明族群語言被破壞消解的真



〈遷村同意書〉以嘲諷的形式發出土地正義的控訴。

實處境。當族人必須使用不擅長的語言來溝通傳達，在「不了解你的明白」同時，或許正是誤解、歧異與衝突的開始。臺灣的各原住民族，自有其複雜完整的語言系統，卻因當代國家機制與教育系統的介入，或許族人通過學習漢語而取得更多現代知識，無形中也將自我語言予以遺忘、放逐，更因此失去了許多族語所傳承、承載的知識文化。

這一區中，選用了布農族作家乜寇・索克魯曼的〈豆類媽媽傳奇〉，擷取其中有關布農族語「TAKI」一詞的雙重意涵，以呈現漢語所無法傳達的族群智慧。TAKI 一詞，同時具有「居住」和「大便」的意義，兩者看似毫無關連，卻因該詞所指涉的家屋、耕種、居住與排泄的連環關係，而形成一種隱然的生態系統，在 TAKI 一詞中，布農族人「藉著『吃』吃出了它居住的範圍、社會關係，乃至於自然世界的想像。」在一個字彙中表現出複雜的先人智慧和天人合一思想，也令人不禁發出莞爾一笑。然而這樣的概念，卻無法以漢語清楚呈現，當族語被瓦解、消滅的同時，作家隱約揭示著族群文化、命運和認同歸屬的消亡，令人從中深切省思。

與語言文化相關聯的，是原住民族族人的姓名認同。雖然臺灣已實施《原住民族基本法》和相關法律，族人可恢復傳統姓名，但當中的許多困難或隱微的阻礙，使得許多原住民不願意或無法「正名」為傳統姓名，也妨礙著原住民族的自我認同和傳統文化之維繫。2018 年新任的行政院發言人谷辣斯・尤達卡（Kolas Yotaka），就曾被部分人士指為名字過長、難記，此一事件正是原住民族回復傳統姓名的縮影，「你的名字怎麼那麼長」的質問，恰巧成為原住民族自我認同的無言抗議。

因此，泰雅族詩人瓦歷斯・諾幹的〈關於泰雅（Atayal）〉，就是原住民作家所發出的最微言大義。這首詩巧妙地運用泰雅（Atayal）的雙重意義，表現於它既是一個族群的名稱，亦為泰雅語「人」的意思；每一個泰雅孩子都來自族群文化的靈魂底層，成為一個泰雅人（Atayal）。第二段作者反覆吟詠「孩子，給你一個名字」，在泰雅族的文化脈絡中，父子連名的命名制，描繪血緣傳承與文化使命之向度。如是，泰雅——Atayal 的意義，將在每一個新生命、每一個延續的族名中綻放。這首詩寄情於給予新生孩子祝福，也寄望族人在重新成為「人」的過程中，展開與祖先的生命對話，找回族群的認同。



文學發聲

除了顯而易見的前述議題，原住民族轉型正義所面臨的更深刻問題，來自歷史詮釋的變異與轉移，誠如前述，歷史發言權的掌握，象徵著文化戰鬥的武器，當原住民作家開始書寫並發聲，才能站在自我認同的位置上，改寫或重寫屬於自己的歷史。諸如「吳鳳事件」、「霧社事件」等歷史詮釋權的爭奪，原住民族得以重新確認發言的主體，當原住民族可以訴說自己的故事，自身的歷史正義才能獲得確認。

歷史詮釋的議題上，選擇了卑南族作家巴代的長篇小說《笛鶴：大巴六九部落之大正年間》中的一章〈笛鶴的尋槍巫術〉。日治時期《理蕃誌稿》中代表日本官方／警察視角的《理蕃誌稿》一段〈沒收卑南原住民之槍械〉之記載，與耆老口述記憶有所出入，促使巴代以《理蕃誌稿》為骨幹，文學想像、部落經驗與田野調查為基礎，發揮「以文作史」的筆法，展開大正年間卑南族與其他部族、閩南人、日人的相處故事。不同於日本官方的史料記載，巴代於〈笛鶴的尋槍巫術〉中安排笛鶴運用巫術，不僅找到偷槍原兇，也間接透露卑南族與日本人、魯凱大南人的歷史糾葛。重寫故事的同時，也翻轉了殖民者對自身族群歷史的定義，書寫的力量由此而生。

當然我們不能忽略音樂歌謠創作，對原住民族文化傳承的重要性。口傳文學、歌謠甚至古調的吟唱，是原住民族表現情感的主要形式，因此除了當代漢語／母語文學書寫，一代又一代創作者以歌曲形式的表現，既是民族記憶最直接的形式，也是原住民文化被外界所接受的最普遍管道。

歌謠傳唱

本展最後選錄了十首歌謠，均是不同時代原住民創作者的音樂呈現，從高一生的〈春之佐保姬〉、郭英男無歌詞吟唱的〈歡聚歌〉、陸森寶〈美麗的稻穗〉、胡德夫



檳榔間浮現的槍枝影像，是真相再現的象徵。

〈大武山美麗的媽媽〉……到新世紀的王宏恩、舒米恩、桑布依等新銳創作者，這些歌曲共同傳達出一個信念，即「唱自己的歌」，如同文字書寫的文學力量，歌謠傳唱也是彰顯自我認同和主體發聲的有力之聲。歌謠是歷史、記憶、文化的複合載體，也是神話、傳說、祭儀、祖訓乃至日常生活經驗的多元集合體，從遠古集體傳唱到當代個體創作，歌謠都是原住民族文化的重要傳承媒介。

總歸來說，本展企圖以文學作品、創作歌謠為核心，使參觀者感受、認知相關議題的重要性。然而「原住民族轉型正義」仍是一個艱難而嚴肅的命題，多少讓人產生距離感，因此，展覽設計必須加以軟化，並加入許多藝術創作、影音放映等素材，並從中傳達多元豐富的原住民族文化內涵。因此，本展取得「巫麥文化創意工作室」授權，以其創作之原住民族圖騰意象繪畫，作為展覽的主視覺元素，在這些繁複的幾何圖形、線條中，將臺灣各原住民族代表意象包涵其中，給人繽紛亮麗而活潑的視覺感受。



希巨・蘇飛的木雕作品，為展場增添更多「原」味。



另外，展場中也與阿美族藝術家希巨・蘇飛合作，展出其創作的多件木雕作品，都是採用河海漂流木之創作，寓意其再生和再現生命的希望之意，為展場空間賦予更豐沛的線條與力量。藉由原住民藝術創作者的作品，提供展場更具體而富象徵性的內涵，彰顯原住民族「主體發聲」的價值。

展場的結尾處，則將此一議題導引至更世界性的連結，簡易介紹澳洲、紐西蘭、美國（夏威夷）與加拿大等各國原住民族轉型正義的案例，帶領參觀者放大視野，理解此一歷史工程絕非臺灣獨有現象，而是世界原住民族轉型正義追求中的一環，無法置身事外。

結語

本次展覽是一項嘗試，打破制式歷史敘述的脈絡，回到文學的本質，以文學為轉型正義主題發聲，更是讓原住民作家為自己發聲。本展所提供的，不僅僅是原住民文學的介紹，更透過文本引領議題的省思與深化，因此所提供的，是一種提綱挈領式的架構，所選的文本並非唯一代表性，而是選擇簡明易懂的故事，傳遞展覽核心價值，至於更多相關題材的作品，就如同繁花盛開的花園，等待讀者們去發現、閱讀及聆聽。

在此特別感謝為本展提供珍貴意見的孫大川教授、魏貽君教授、董恕明教授、劉智濬教授、陳芷凡教授、王文華教授，為本次展覽定下清楚的核心目標與敘述基調。同時魏貽君教授、董恕明教授、劉智濬教授、陳芷凡教授，承擔了撰寫展覽內容與文案的工作，與本館共同策劃了這個具有意義的展覽，居功厥偉。原住民族轉型正義的工作，非一朝一夕能夠完成，我們必須藉由文化、社會、政治等多元力量，分進合擊才能逐步實現，本次展覽以文學為出發點，為這樣的歷史工程盡一分心力，也期待能成為一個起點，促使人們更深刻體認，那麼轉型正義的理念，才有落實的一天。

在此之前，何妨讓我們就坐下來，閱讀更多原住民文學，聆聽族人的傳唱，讓我們用這些故事，開啟彼此尊重的大門吧。✎